

试论马建忠与天主教之关系

陈凤

(巢湖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 作为一位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马建忠对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道路作了种种探索。由于马建忠与西方宗教之间的联系,又使其思想和活动具有特殊性。他的教徒身份在近代中外文化冲突十分激烈的环境下,对其仕途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马建忠的一生都在摆脱宗教背景对他的影响,但还是不为主流社会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晚清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同时在马建忠的身上体现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共有的矛盾心理,即中西文化的交汇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马建忠;天主教;天主教徒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68(2007)02-0113-05

中国近代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是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传统社会上层的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和代表了正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新兴势力,主张用和缓渐进、暂时不作根本变动的办法,来改革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萌芽,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史上,马建忠是与薛福成、郑观应、王韬等齐名的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作为一个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马建忠对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道路作了种种探索。他的思想是标志着十九世纪下半期进步思想发展的界碑,也是探索者走过的足迹。

马建忠身处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阶段,即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时期。其特别处就在于:他既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的教徒,也是反传统地向西方学习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尽管马建忠对于天主教信仰的持守是短暂的,但是他与天主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早期教会生活

马建忠,字眉叔,谱名志民,学名斯才,幼名钦良,单名乾。^[1]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今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家族信奉天主教。在少年时代,马建忠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这种特殊的宗教背景和教会学校教育,表明教会在他早年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于南北交通枢纽的镇江,是中国天主教最早传入地区,早在元代就有关于天主教徒的记载。大约在明朝末年,马家皈依了天主教。马建忠的家乡——江苏丹阳的马家村,到了清代逐渐发展成为聚族而居的天主教村落。尽管康熙末年就开始不断禁教,但是一些天主教家族世代保持这一信仰,马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在鸦片战争以后,丹阳附近大约有天主教徒七八百名。从无锡到扬子江边这一地区,有七八百名丹阳教徒聚居在四所小教堂周围;另外还有三百名左右住在城内或近郊。马建忠的父亲、母亲及祖父、祖母就是其中几个“老教友”。因为父母都是天主教徒,马建忠出生后不久,就在教堂受了洗礼成为小教徒,取教名为“玛弟”。

由于天主教家庭背景,马建忠从小生活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里,童年时代便耳濡目染,受着《圣经》教义的熏陶。母亲沈氏是一个贤惠正直、深明事理的人,而且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对马建忠兄弟的教导非常严格,尤其注意对孩子在教义、教规上的教育。后来马建忠虽然退出了教会,但是他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却保持了一生。可见,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建忠的少年时代是在徐汇公学度过的,它对马建忠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天主教耶稣会素来以办学著称,它所办的中等学校一般称为“公学”。徐汇公学就是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也是天主教会创办较早的一所学校。1849年五、六月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水灾,许多难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儿童。上海徐家汇耶稣会的司铎设法收容这些孩子,并且加以教育,这就是徐汇公学的胚胎。1850年时达到二十一人,而且其中不乏优秀子弟,于是把临时收容改为有组织性的教导,正式成立学校,取名叫徐汇公学。由于这是耶稣会所办的学校,所以奉耶稣会依纳爵为主保,故又称为依纳爵公学。这就是徐汇公学的由来。^[2]

1851年,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这所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就在马相伯进入徐汇公学学习的第三年,因清军与太平军在其家乡镇江交战,马家不得不辗转搬迁。过了不久,马相伯一家终于全部迁到了上海。全家迁到上海后,弟弟马建忠也进入徐汇公学,这一年马建忠年仅八岁。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学名为马斯臧,马建忠学名为马斯才。此时徐汇公学的校长为意大利人晁德莅(Angelo Zottoli)。他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汉学家,1848年来华,终身寓居徐家汇,后来还曾担任耶稣会初学院的院长、神学院神师等职务。^[3]马建忠就是在徐汇公学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精汉学,并擅自然科学,先生(马建忠)从其游,潜心于希腊、拉丁、法兰西文字及数理等学。”^[4]

徐汇公学初创时的课程设立还比较简单,它以后的课程及教学改革是与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分不开的。晁德莅(Angelo Zottoli)对该校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使徐汇公学发生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变化,尤其是学校规模在短短几年内不断得到了扩充。徐汇公学课程与教学的一

大特点是,以教理为主,同时兼习中国传统儒学课程。但这期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一直较为鼓励公学的学生在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同时,通过科举,或成为官学生,或跻身仕途。因此,在徐汇公学学习的学生均有责任在校为各级科举考试做准备。和哥哥在徐汇公学做着科举梦一样,马建忠早期在该校的学习,目标之一也是梦想一朝金榜题名,但很不幸的是,马建忠自1860年“执笔学举子业”以后,^[5]在科举之途上毫无建树。与哥哥不同的是,马建忠很快从科举之梦破灭中猛然警醒。他感到应该从泰西之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从而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开出可以救治的药方,而不再沉湎于过时腐朽的八股文之中。从此,马建忠即弃其前所学,深入研究当时之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后则一跃而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徐汇公学的学习生活,使马建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儒家孔孟文化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就是一种批判眼光。马建忠在徐汇公学打下的扎实的国学及国文根底为他以后游刃有余地从事学术研究及洋务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甚至也为他在日后外交场合派上了用场。和当时封建官学和洋务学堂不同,在徐汇公学,中、西两种主流文化可以自由传播。这种特殊的思想环境和教育渊源使徐汇公学的学生置身于两种可以互相交会碰撞的思想语境之中。在两种互相参照的文化体系里,无论是之于儒学,还是之于西学,徐汇公学学生都可能获得较为准确的判断能力。显然,徐汇公学的教育为他思想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马建忠和哥哥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学习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原本他们都很有可能走上从事教会事业的道路,但是在1870年,发生在马建忠兄弟身上的一件小事,对马建忠离开教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刺激了马相伯。当时,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住在徐汇公学一座朝南的房间。他们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年了。这一年,从巴黎省来了一位法籍修士,修院按塔扬(Tailhan)神父将这位法籍修士安排到马氏兄弟的房间去。在平常,对修士宿舍进行调整,算不上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但现在,为了安排一位外籍修士,中国修士就要让出原来的住处,也就是说,在按塔扬(Tailhan)神父看来,中外修士地位是有高低之分的。血气方刚的马建忠,身为四品修士,当然受不

了这种侮辱,一气之下,愤而离会。其时,马相伯已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学问的研修,正准备神学博士学位的考试。为此,马相伯强忍着留了下来,但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刺激。^[6]

此次事件说明,当时在耶稣会内部也存在着修士待遇不平的现象,对外籍修士的优待和对中国修士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而马建忠兄弟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思想,所以他们对教会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尽管出身于老教徒世家,但是他们都先后退出了教会,以示抗议。而教会方面对他们的行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江南传教史》记载:“1872年,在华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江南教区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以实施科学与文化研究方案,扩大天主教在华的影响。高龙磐(Colobel, Auguste)神父还负责专门培养有关科学观察方面的人才。两位耶稣会读书修士,马氏两兄弟,马若瑟和马玛弟预备将来负责管理这个部门;可惜他俩没有恒心,终于还俗出了修会,后又进入政界,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7]文中提到的马氏两兄弟就是马相伯和马建忠。这段文字没有对马氏兄弟二人还俗退出修会原因作出交代,实际上,马氏兄弟二人并非对科学工作毫无兴趣。在徐汇公学及修道院期间,马相伯曾怀着极大的兴趣投入到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中。

教会方面推卸责任,把马氏兄弟退会归为两人的原因,实际上却在实际活动中对马相伯、马建忠等中国籍修士和神父百般排挤。教会安排马建忠兄弟参与科学研究,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在这一借口之下,是对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排挤和搁置。从客观上说,马建忠和马相伯先后退出教会的原因是出于不愿意继续为压迫中国人的外国宗教势力服务,他们要为了中国的崛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马相伯后来虽然又回到教会,但是他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天主教的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而努力,并为之奋斗终身。

2 教徒背景对其影响

马建忠的教徒身份,使他得以进入西方教会学校学习,较早接触到西方的语言和思想文化。教会学校的教育让马建忠成为洋务派所需要的人才,并参与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在这场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运动中,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名早期改良主义者。

从天主教徒到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所走过的道路在同时代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卷入社会变化的潮流中去,荣辱沉浮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建忠作为出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必然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他的身上有可贵的先进思想,也有传统社会留下的深深印痕。

从明代利玛窦来华开始,马建忠的家族成员就成为天主的信徒。而在儒家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家族注定处于社会的边缘,注定要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挤压。对于家族成员来说,这样的家族背景,除了意味着被正统的士人视为异类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从此与仕宦之途绝缘了。从马建忠在晚清官场的沉浮可以看出,教徒出身的家庭背景成为他仕途上的一大阻碍。

由于康熙末年罗马教会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方针,禁止教徒祭孔和祀祖,从而导致“礼仪之争”。自雍正时期起,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天主教逐渐不为士大夫所接受,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也鲜有信教者。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强迫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由此引起民众反感,更加为士人所不齿。而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教案最多的时期,不仅上层社会,连一般民众也对天主教的印象也十分恶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马建忠的教徒出身,无疑使他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早年,马建忠虽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且也是耶稣会的一名修士,但当他认识到教会内部中外修士的不平等后,便无意做一名神父,而愤然脱离教会。当然,对于科举正途,马建忠也曾抱过幻想,但当他彻底认识到八股文的空疏、腐朽以及无用之后,即决定弃其所学,转而研习西学。他要以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学问与知识去实现他的用世之志。马建忠既不甘心终生做一名身着长袍的修士,也不愿从科举之途上讨生活。

现实社会比马建忠想象的复杂的多。马建忠以为脱离教会就可以走出基督教家族文化的阴影,顺利地进入主流社会,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是马建忠自己心中的幻想。当时整个社会还是封建顽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是极其有限的。而传统社会对于与儒家正统文化相抵触的天主教,从根本上说还是抵制的。马建忠在上海

轮船招商局被免职,以及饮恨上海机器织布局,都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对于天主教家族文化背景出身的马建忠,有一种深深的排拒心理。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作为李鸿章幕下一名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干将,马建忠在此期间多次参与中外交涉活动,在一些中外交涉中还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弱国无外交,纵然马建忠饱读世界各国公法律令,精通国际交涉之惯例,拥有中外交涉之一流外语,但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他及其同时代的外交家的命运也只能是一个悲剧。比其他同僚更为不幸的是,因为家族天主教的文化背景,马建忠一直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异类。即使在出使朝鲜时,为大清帝国保存了一些面子,但李鸿章的请奖折照样被总理衙门总署以种种借口敷衍过去。而一旦参与交涉的事务“有失国体”,马建忠即为千夫所指、万人所置。他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所参与的“售产换旗”就是其中一例。

光绪八年十月十二日,李鸿章的《查复马建忠参案折》指出有人控告他说:“马建忠为天主教民,与沈惟敬同一市井无赖,恐蹈覆辙。”李鸿章辩解道:“该道幼习儒书,屡试不售,嗣游学泰西,兼习法文,本非教民,亦非市井。”^[9]后来与马相伯齐名的天主教界著名人士英敛之在撰写《与某公金正希奉教事》(收入《安寰斋丛残稿》)时说:“读李合肥全集,有人奏参□□□(按即马建忠)系天主教人,万不可用。李为之复奏云,□□□非天主教云。系天主教,非天主教,即以定人之邪正及可用与否,一何可笑!”^[9]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教民的厌恶程度。

马建忠后来的一些著作中,都未明确提及到他的教徒身份。这也反映了当他退出教会后,希望别人忘记他的这段过去。实际上,后人很难知道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对于基督徒的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尤其是希望能在仕途上获得发展的马建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仅见的资料看出,马建忠虽然离开了教会,但是教徒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在他去世之际,上海著名报纸《申报》报道说:“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傅相器之倚之如左右手马观察建忠本月初八日犹在行轺译紧要文牒,及午夜而返,渐有倦意,未几即气弱如丝,延至初十清晓六钟时,溘然长逝。观察素奉天主教,翌日家人依教规例殓殓。昨日晨

祈北门外外圣若瑟堂行追思礼。”^[10]从以上报道中可以看出,马建忠虽然很早就脱离了教会,但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天主教徒这个身份的束缚。

在马建忠的官场生涯中,曾被李鸿章奏保多次,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厚爱。但不幸的是,马建忠始终官运不佳,未能获得一官半职。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与明清以来注重门第出身、崇尚科举正途的社会风气有关。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虽博得洋功名,实际上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来,这种功名实在不能与科举功名相提并论,因此,尽管马建忠满腹新知,学有专长,一生也只能充当李鸿章手下的一个真正的杂役,而不能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独当一面。在近代中国,有此遭遇的不只马建忠一人,容闳、严复等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开风气人物也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3 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矛盾

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的,西方文化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因此,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充满冲突的,这种冲突主要围绕三种矛盾开展,即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而在马建忠的身上,这三种矛盾都有体现。他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裁厘加税和抵制外资入侵等思想,表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近代外交制度和近代海军,表现了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而他与基督教的联系和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又表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的矛盾。尤其是在第三个方面,与当时其他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相比,表现更为突出。

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这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家族,因为天主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宗教。自雍正禁教后,天主教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天主教徒受到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的排斥,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况且,天主教徒是隶属于教籍的,在地方上没有户籍,更使他们不能奢望融入大社会。后来有人弹劾马建忠“市井无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早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建忠就已经感受到了两种文

化的冲突,一边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一边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两种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太平军进抵江南时,马家辗转逃到上海。那时,马建忠正在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汇公学就学,一面学外国文,一面“执笔学举子业”。江南科举考试的不克举行,阻塞了马建忠的进身之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马建忠鉴于外国侵略者以偏师北上,竟能迫使清朝政府屈服,有意“深求其得失之故”,才决心改学洋务。他追求西方知识的动机,是出于年青人朴素的爱国思想的;但一开始就限于希望有一天能代替那些“决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而为“我朝”用。^[11]这说明,虽然马建忠是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不忘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必走的道路,学习西方文化只是为了为更好的走上仕途。而且,一旦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他所选择的仍然是走传统文化的道路。所以,他后来退出教会的举动,也不能完全理解为一气之下的冲动行为。实际上,他一直都未把天主教作为终身的事业,而天主教会的不公正作法,就促使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会事业的打算。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了“基督教改革派”的说法,并把马建忠也归为这一类。他指出:“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1828-1897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1844-1900年),人们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这些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藩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体系。毋宁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

参考文献:

- [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2016.
- [2] 徐汇公学校史[A].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201.
- [3]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260.
- [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9.
- [5] 马建忠.自记[A].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23.
- [6] 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64.
- [7] (法)史世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207.
- [8] 查复马建忠参案折[A].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767.
- [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305.
- [10] 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76.
- [11] 马建忠.自记[A].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23.
- [12]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45-646.

样我们就发现,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说。因此,需要进行改革。”^[12]

马建忠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态度,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普遍态度。从带有西学背景的天主教家庭出身,到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马建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根据正常推理,他应该是十分崇尚西方文明的人。但是,马建忠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西学。在他的眼里,西学知识是改革中国的工具。他虽然超出了洋务派的思想藩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圈子。对于马建忠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根本。从李鸿章对他的奏保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西学和中学皆通的中西全才。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李鸿章对他格外赏识。

结语

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史上,马建忠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但也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马建忠同时具有天主教徒和儒家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他的人格也具有双重性。作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马建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他的一生都处在这样的矛盾中,而且也始终无法真正解决这种冲突。马建忠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是晚清社会的一面反光镜,折射出个人在新旧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独特影像。

试论马建忠与天主教之关系

作者: [陈凤](#)
作者单位: [巢湖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刊名: [巢湖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
年, 卷(期): 2007, 9(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2条)

1. [方豪](#) [方豪六十自定稿](#) 1969
2. [李楚材](#) [徐汇公学校史](#) 1987
3.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73
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73
5. [马建忠](#) [自记](#) 1994
6. [薛玉琴](#), [刘正伟](#) [百年家族——马相伯](#) 2003
7. [史世徽](#),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 [江南传教史](#) 1983
8. [查复马建忠参案折](#) 1998
9.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73
10. [薛玉琴](#), [刘正伟](#) [百年家族——马相伯](#) 2003
11. [马建忠](#) [自记](#) 1994
12.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1985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刘立松](#) [强国护商得民心——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书屋](#)2006, "" (3)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天主教徒,在家乡行医经商.
2. 学位论文 [陈凤](#) [从天主教徒到改良主义者——对马建忠的个案研究](#) 2005
马建忠是天主教徒,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本文通过研究马建忠的生平,体现出这个人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强调特殊的身世对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影响.同时对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将其思想分为经济、外交、海防三个方面,并结合时代特点予以历史地具体分析.另外,通过对其人物关系的研究,展现了这个人物的活动全貌.该文把马建忠的思想纳入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考察那个时代赋予当时人的历史使命和马建忠对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的解答,分析其思想发展之成因和特点,从而试图对马建忠的思想做出较为适当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haoxyxb20070202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ba24fc9-634e-4c10-b4b4-9e4d008192f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